

红山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于怀石 郭明 贾笑冰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大，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肇始于距今6500年，存续长达1500年；其核心区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南、大小凌河流域、努鲁尔虎山一带，向北越过西拉木伦河、向东越过医巫闾山至辽河西岸、南至渤海北岸、西达燕山南麓京津一带，其影响范围可至更西一些的区域。

回顾

红山文化考古工作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起步较早，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今赤峰地区的考古调查，此后，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也多次对上述地区进行调查。红山文化的发掘工作始于1921年锦西沙锅屯遗址的考古发掘，发掘者安特生认为这是中原仰韶文化的北方变体。此后，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集中获取了一批红山文化遗物，考古发掘报告将其命名为赤峰第一期文化。1954年，尹达先生在其《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将这一支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

自20世纪60年代末，红山文化发掘工作陆续开展，西水泉、蜘蛛山、四棱山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整体面貌；胡头沟、城子山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积石家的认识；东山嘴、牛河梁坛庙家礼仪建筑的发掘更是引发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也为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构建提供了证据。这一时期红山文化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包括分期、类型、渊源研究、玉器研究及文明起源相关研究。

首先，在红山文化分期、类型研究初期，分期与类型的界限并不清晰。有学者关注到赤峰地区和朝阳地区红山文化内涵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两个类型，提出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遗存可能早于朝阳地区红山文化遗存；或将红山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并将其划分为兴隆洼F133遗存、西水泉、东山嘴三个类型。考古资料的丰富为分期方案的细化提供了材料基础，分期结果从最初的两期逐渐细化为四期，大体确认红山文化的发展历程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半坡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西阴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时期。而无论采用何种分期方案，对大小凌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的年代判定则相对统一，属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

此外，区域类型的划分也愈加细致，从研究初始阶段分期与类型混用，逐渐转变为在时空框架研究基础上，根据同时段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划分文化类型。大量具有中原文化特征遗物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对红山文化渊源的探讨，但是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磁山文化，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与北方细石器文化互动而形成的一种混合文化，也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受到仰韶文化影响的北方土著文化。最后一种观点一度被普遍认同。

第二，红山文化有着发达的崇尚玉器的传统，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内容涉及玉器的加工工艺、造型纹饰的来源、文化交流、礼制与社会规范等方面。

相关研究显示红山文化玉器多采用线切割、片切割、钻孔技法，结合平雕、圆雕、镂雕工艺并通过打磨加工成型，玉料可能来自贝加尔湖地区和辽宁岫岩地区，但从玉料到墓葬中的玉器的制作和流通链还不清晰。辽西地区用玉传统起源于兴隆洼文化，器类主要有玦、凿、匕、管等，造型简单，在房址、墓葬中均有发现。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丰富且造型多样，基本只见于红山文化晚期墓葬内，部分器形可以从兴隆洼文化找到原型。研究者普遍认为红山文化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用玉传统，兴隆洼文化玉器制作和使用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红山文化玉器更多是作为礼器成为红山人精神的载体。有学者根据红山文化墓葬唯玉唯葬的埋葬特点，提出在红山文化中以玉器为载体的精神文化高于物质文化。

第三，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新一轮大讨论。在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苏秉琦先生即提出“红山文化坛庙家，中华文明一象征”。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家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也有学者通过对女神庙结构和积石家的分析，认为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还有待证明。这一时期关于文明起源的关注点多集中在文明起源的要素以及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

进入21世纪，随着红山文化中外合作项目的开展，先后在赤峰地区、喀左县大凌河上游地区、牛河梁遗址展开了有关人口、家户、社区组织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形成了对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的新认识。国内学者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工作，内蒙古敖汉旗、辽宁省喀左县、建平县、凌源市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址，为了解区域内红山文化的分布、内涵等提供了材料，为未来发掘和研究规划的设定提供了基础信息。通过蚌河、老虎山河流域调查所获得遗址分布、面积等信息，研究者提出红山文化的聚落已经出现了等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显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复杂化社会阶段。为全面认识红山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组织结构，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红山文化聚落考古，兴隆沟、魏家窝铺、马鞍山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址，田家沟、半拉山墓地的发掘及其他大量配合基本建设发掘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深入了解和认识红山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开展，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发展进程研究工作迫在眉睫，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于2017年重启，以揭示牛河梁遗址礼仪中心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明确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该阶段，考古工作的科学规范、材料的丰富、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多样化极大地拓宽了红山文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考古调查大量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以及GIS等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促成了一批有关红山文化人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环境变化和入地关系的分析显示，河谷台原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聚

落规模也存在逐步扩大的趋势。聚落选址除考虑与水源的距离，兼顺利于农业生产与邻近石器资源地点等多方面因素，聚落的连续利用率相对较高，部分聚落可以发现延续多个时段的遗存，表明同一聚落的延续使用时间有所增加。

其次，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野生动物种类丰富，所占比重较大，加上出土的大量细石器均反映出红山文化居民较为依赖狩猎活动获取食物。而遗址中出土有一定数量的炭化农作物粟、黍种子，反映了红山文化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业经济。有研究者指出只有在明显的产品剩余时才有可能出现牛河梁遗址所显示的礼仪建筑群，因此应当至少存在占比较高的农业，还有待于相关线索的发现。

第三，红山文化以及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发掘工作的持续开展为细化红山文化分期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赵宸福通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将红山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年代分别与中原地区半坡文化晚期（后岗一期文化）—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河套地区庙子沟文化相当，陈国庆、索秀芬、刘国祥均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分期方案略有不同。除红山文化整体分期研究，吕学明、朱达将牛河梁遗址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索秀芬等也将牛河梁遗址整合为早、晚两期，王芬、栾丰实将牛河梁遗址划分为两期四段，张星德通过对材料的重新梳理，进一步辨明了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将牛河梁遗址划分为四期。郭明也将牛河梁遗址分为四期，并对第四期的墓葬进行了细分。

学术界对红山文化谱系和源流也有了新的认识。红山文化是北方土著文化在与中原文化交流碰撞后形成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曾被广泛接受。最近，也有学者指出鉴于红山文化中所出现的大量后冈一期文化的特征，指出红山文化早期（或称为后冈期红山文化）可能为后冈一期文化的人群进入辽西区创造的文化。这些不同的观点也显示出进一步工作的必要。

最后，有关红山文化文明起源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者逐渐开始从红山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方面全方位地对红山社会进行剖析。中美合作开展的赤峰地区和大凌河上游地区的考古调查从陶片分布密度的角度获取了关于人口密度的信息，据此建立的人口分布模型则可以直观地判断区域内的人群和社会组织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红山文化出现了多个规模各异的“社区”，社区之间平等共处。对于这种特征的社会是采用酋邦或是古国的定名的意见虽然不一致，但基本认为至迟到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化的特征。红山文化晚期作为社会公共活动场所的“坛”和墓地（积石冢）、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成为探讨红山文化宗教与礼仪活动的重要切入点，有研究者指出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墓主可能为巫师或是萨满，是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领导群体。而红山文化晚期崇尚玉器与偏重祭祀等礼仪行为的迹象显示出红山文化不同于中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特征。但是，与牛河梁遗址大型祭祀礼仪活动遗存规模相当的居住区的缺乏以及能够产生足够剩余产品的农业发展水平证据的不足都使这种认识遭到了质疑，关于红山文化社会发展进程研究仍需进一步探索。

展望

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研究 由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特殊性，遗址的延续时间通常较长，遗址之间也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无法为年代划分提供有效参照，红山文化的分期多是依据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文化序列完成的，受参照系的影响，虽然可以确定文化的总体发展脉络，但对具体遗址的年代判定仍存在争议，根据遗物判断具体遗址的年代时仍要面临无法与分期所设定的标型器对应的问题。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分别以西拉木伦河和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的辽西红山文化特征上的差异，而来自目前的分期结论来看，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早期遗址较多，大小凌河流域的遗存年代相对偏晚，这种差异可能也与年代的早晚有关。也就是说，虽然确定了红山文化大体发展的脉络和阶段，但仍未能建立起完善的时空框架，仍需要更多的工作及典型遗址的资料为此提供信息。

红山文化的源流和文化谱系研究 红山文化是在本地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与中原仰韶文化互动而形成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观点曾被较为广泛接受，但有新的观点认为红山文化是来自后冈一期文化的移民接受了本地的考古学文化而形成的，虽然都认为红山文化是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果，但文化主体存在明显不同。上个世纪末形成的辽西地区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的文化发展演变序列也受到了新的挑战。关于红山文化同与其年代略有先后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特点、机制研究 从器物制作特征入手探讨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与祭祀礼仪行为相关的陶器制作工艺要求和专业化分工程度都相对较高，而专业化分工的精密程度可能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有关。对玉器制作工艺的研究也可以形成类似的专业化生产分工的结论。但目前并未发现红山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作坊，根据器物上遗留的制作痕迹所形成的生产专业化分工的结论仍需要进一步补充完整的操作链的信息。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分析也同样存在证据相对单一的问题，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掀起了学术界对文明起源讨论的热潮，但目前学术界对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现在的研究结论是通过牛河梁遗址这类特殊遗址的分析获得的，与可能相关的居住址的相应证据则较少，与社会组织结构紧密相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形态等线索不足，红山文化文明发展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随着“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开展，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发表，相信包括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源流、文化谱系、社会发展机制、文明化道路等问题会寻找到突破口。（作者单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22年，新疆地区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18项，完成配合基本建设、文保工程项目考古发掘27项，工作区域遍及南北疆，发掘遗址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时期，所获成果丰硕。

考古新疆 探索源流

吉木乃通天洞遗址是新疆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遗址，将新疆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4.5万年前后。据该项目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军介绍，2022年，一号洞内东边扩方区域清理至6B层。二号洞口T0118清理至13层、T0119西侧区域向下清理至12层。发现距今约5000年的锡青铜管饰件、素面陶片和浮选出炭化黍作物，细石器集中在距今8900~13000年的地层10~12层中。此外，洞外旷野处清理墓葬石板石棺墓2座，灰坑、灶坑7处，柱洞2处。据介绍，2022年已是该遗址的第七次考古发掘，七年成果的积累，让考古人认识到，通天洞遗址填补了新疆史前考古诸多方面的空白，它不仅是一处综合性遗址，且极有可能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聚落遗址，并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遗址规模变小，但有线索表明附近可能会有更大遗址。于建军还指出，遗址年代也不局限于四万五千年前，一号洞内的堆积可能会更厚。同时，黍麦相逢在通天洞，表明四五千年前这里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史前考古学区系类型和聚落形态研究逐步深入，以东、西天山为重点的史前聚落和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为例，如温泉呼斯塔、尼勒克吉仁台沟口、疏附阿克塔拉等青铜时代大型聚落遗址，不仅丰富了新疆史前文化内涵，还为新疆史前聚落发展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2022年，温泉呼斯塔遗址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城址内院落的南院门、西城墙中部以及城址西南部墓地的第1、2号冢（Z1由9座连体墓葬及1座独立祭祀坑组成、Z2为单体石围墓）。Z1、Z2与城址位置临近，年代相同，有可能是城址相对应的墓地。在谈到发掘收获时，该项目汇报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鹏表示，“去年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呼斯塔城址的布局，聚落的布局，同时也丰富了对西天山地区公元前2千纪中叶青铜时代遗存的认知，特别是首次对Z1M1为代表的房屋式墓葬结构的揭示，对理解西天山乃至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同类遗存具有重要意义。”汇报时王鹏不经意间提起的狂风和暴雨、毒蛇偷袭与熊出没的故事，也让我们体会到，即便考古人早已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野生活，但出门在外，从花鸟鱼虫到洪水猛兽、从衣食住行到安全保障，他们需要考虑的远不止是如何发掘。

目光转向与呼斯塔遗址一山之隔，属于同时期且文化属性相近的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这里出土的木质车辆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木质车辙实物资料，出土背景明确、特征鲜明。”2022年，在吉仁台沟口遗址南部的高台遗存东北部G33灰沟内，发现了木质车轮及构件两组40余件，其中实心木车轮11件，车轴、车轴、车厢等木构件30余件。“初步判断是营建高台冢冢过程中使用的，被废弃后进行了拆卸并有意识地集中掩埋，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距今3500年，这是中国车辆史上的重要发现，为研究车辆使用和东西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该项目领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阮秋荣认为。

除天山一线外，南疆地区史前遗址近年也备受关注。2021年起对疏附县阿克塔拉遗址展开发掘，揭示其为一处以青铜时代遗存为主体的大型聚落，同时也存在多个不同时期遗存。南京大学教授水涛指出，测年数据显示至少3个不同时期遗存。其中遗址点5第8层年代最早，为2000BC—1800BC，遗址点5第6层、遗址点6第5A层、遗址点9第2层年代为1800BC—1400BC，遗址点4年代最晚，第7层第9层年代为1400BC—1300BC。目前编号点多达38处，面积差别大，可能存在较大的聚落中心，且出现等级分化，青铜冶炼相关遗物可能与聚落原本功能分区有关，可以说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南疆地区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的空白。

寻城——新疆的“城址考古”

以汉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军政建置相关核心城市为重点，开展的南北疆10余处城址及其他军镇设施遗址的发掘，推进了对乌垒城、北庭故城、疏勒城、羯盘陀国故城、李罗城等一系列西域历史名城的持续探索。

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是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寻乌垒至今何在？根据文献记载，乌垒城可能位于今天轮台县附近，这恰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卓尔库特古城位置相当，由此，暂时将目标锁定在了二者之中。

多年的考古发掘，明确了轮台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的发展演变过程，即早在公元前770年该区域已有人群活动，形成一定规模环壕聚落。约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修建高大的城墙和中心高台延续至公元前后期废弃。

2022年，轮台卓尔库特古城遗址的工作重点集中于发掘城中高台遗址，发掘与研究确定了城址的特殊三重城结构，城址建造和使用的年代为战国至魏晋时期。城内规模宏大的房址、朱漆木柱等是高等级城址的具体反映，证实了城址为西汉时期丝路北道的一处重要城镇。会上，也有专家发出了“卓尔库特古城到底距离确认到乌垒城还有多远”的感叹。

北庭都护府军政建置体系多年的考古工作，厘清了北庭故城的沿革历史与布局规律。2022年，北庭故城清理1000平方米，清理灰坑37个、水井5个、房址1座，中部残留一个晚期夯土台基。出土诸多建筑残件，发现了壁画碎片，证明该建筑群应为宗教场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介绍，去年的发掘情况表明，13号遗址虽破坏严重，但应当和10、11号遗址共同构成品字布局。这一区域在唐朝时，和西北中轴线上夯土台基上的大殿以及西面的院落共同构成子城西院南院中的重要建筑群。此外，根据悲田寺线索，可认为院落曾经承担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体系中佛教功能的作用。随着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不断深入，格局逐步清晰，历史文化内涵日益丰富，郭物也呼吁未来要把北庭故城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并充分认识到北庭故城遗址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意义。

喀什汗诺依遗址是首次在喀什绿洲通过考古发掘确认的大型聚落遗址。2022年度工作以在遗址中部和北部发掘解剖沟为主，发掘目的旨在了解遗址边界和两座城邑的形制布局等信息，厘清两城之间的各类遗迹分布的时空关系。目前，确认了古城时代，墙内5处测年数据为距今960~1020年，发掘揭示出唐宋时期城邑形制大体面貌。遗址东城墙测年早于距今1700年，形制规整，有可能是东汉疏勒国城中城。

博乐达勒特古城的发掘确认了基本形制，明确了内、外城建造演变关系，推定城址为文献所载“李罗城”旧址，填补了宋元遗存考古的空白，对建立该时期北疆地区年代序列具有重要作用。

交融共存 互鉴通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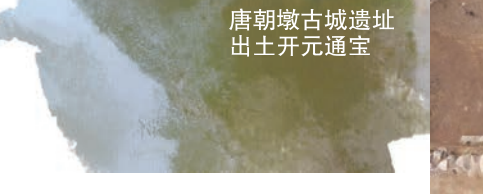
数项考古发现，如喀什莫尔佛寺、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吐鲁

考古上新 精彩之疆

张小筑



唐朝墩遗址浴场内部结构（东南—西北）



唐朝墩古城遗址出土开元通宝

吉仁台沟口遗址出土木质车辆构件

番西旁景教寺院等，也实证了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地区宗教格局的特点，交融共存始终是新疆地区宗教关系的主流。

唐朝墩遗址景教寺院平面近不规则长方形，外围建有围墙，内部由东西两部分组成，西侧为寺院主体建筑，包括中殿、祭台、圣堂和后廊；东侧为生活区，包括南部庭院和北部房址等。2022年度的考古工作则继续清理遗址内景教寺院的围墙和主体建筑东侧生活区等，发掘面积862平方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寇在介绍遗址具体年代时表示，“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印证了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唐代，为庭州蒲类县城，沿用至高昌回鹘、西辽和蒙元时期，至14世纪中叶废弃。佛寺始建年代为唐贞观年间，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并经修缮改建，至蒙元时期与古城同时废弃。景教寺院始建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高昌回鹘时期扩建与修缮，西辽时期毁坏后重建，至元末与古城同时废弃。可见，五六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一直是共存的。”

喀什莫尔寺遗址2022年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除对Ⅱ号建筑东部区域进行清理，进一步明确Ⅱ号建筑的结构和平面布局外，又新发现Ⅴ号建筑，Ⅴ号建筑疑似为一处禅房遗址。此外在覆钵塔东区域发掘出土Ⅴ号建筑，这是一个由多个不同功能的房间构成的大型建筑，已清理出F1—F4，其中三个设有坐台可能与禅修有关。一个房间内设有贡台，台前地面有香灰可能为贡佛之所。中央民族大学肖小勇表示，莫尔寺考古是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传播和佛教寺院变迁、佛教造像艺术演变及汉唐时期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是佛教文化在喀什一带盛行的有力见证，对新疆宗教演变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是中国现存的最少几处古代景教地面寺院遗址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极少数早期景教遗址之一。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目前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区域遗址的全面揭露，出土了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书残片，壁画残块及陶、木、铜、铁、织物等重要文物千余件。其建筑遗迹复杂的层位关系显示出三期以上的使用过程，该遗址可能始建于唐，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

支持基建 保护文物

2022年，为配合基本建设或文物保护单位顺利实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各地州文博单位在哈密、吐鲁番、伊犁、塔城、阿勒泰、巴州等地开展考古发掘27项，所发掘遗址时代早自青铜时代，晚至元明时期。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基建考古工作一如既往地实施精细化发掘，多学科合作深度介入，其成果在推进新疆考古研究深度广度方面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主动性考古项目的重要补充。

包容情怀广，担当格局宽。如今，更多的考古机构参与到新疆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之中。我们看到，十余家科研单位和高校陆续奔赴新疆，推动新疆地区旧石器与人类起源、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佛教石窟寺、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要课题研究。他们带来了前沿的发掘理念，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和文物保护技术，使新疆考古发掘工作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新疆考古承担着构建新疆考古文化谱系、总结新疆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索新疆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中的作用等根本任务。这也要求考古人在脚踏实地、扎根田野的基础上，拥有更宽广的学术视野，随着视野日益开阔与深入，我们对于新疆考古也必以往看得更深，了解得更深。

诚如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在闭幕式上的总结所言，新疆考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为推进新疆文物考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家文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对新疆考古事业给予了高度关注。新时代新征程，新疆考古工作还将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更好研究阐释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弘扬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总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